

# “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及其新闻观念： 关于19世纪报纸的一种叙述

涂凌波

## 摘要

本文通过观念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路径，考察了19世纪一部分中国人对于现代报纸的认识和理解。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等“自西向东”的办报者不同，一部分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主动地发现了现代报纸，作出了相应的观察和叙述，并形成了他们的新闻观念。清廷派遣的使臣直接接触过西方的报纸，他们看到了报纸具有“内外通情”和“上下通情”的功能，是一种代表民意的“公论”，是议会制度运作的重要环节，亦是西方国家“富强之本原”；身处通商口岸的中国知识分子，则将报纸看作是重新参与政治的“庶人之清议”，是“通今”之术和一种治国之道。源自西方的关于报纸的新知识和新观念，在与中国传统知识和思想对接中产生了冲突与紧张。经过对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改造，最终形成了“中体西用”框架下的新闻观念。

## 关键词

出使大臣，现代报纸，新闻观念，知识社会学，“中体西用”

## 作者简介

涂凌波，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讲师。电邮：tulingbo@126.com。本文是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中国现代新闻观念的产生：基于知识社会学的考察（1815-1926）”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CUC15A05。本文亦受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中国大陆新闻传播青年学者访问项目2014-2015”的资助，邮编：100024。

## Going to the World and Generated Ideas of Journalism: A Narrative of Chinese Newspapers in the 19th Century

TU Lingbo

## Abstract

Adopting the method of ideas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a part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realized and understood modern newspaper in the 19th

century. Different from foreign missionary and merchant, the founders of Chinese modern newspapers, some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d been actively discovered, read, observed, described modern newspapers and formed their ideas of journalism. These Chinese intellectual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early envoy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intellectuals in treatyport cities. Some early envoys directly observed western newspapers, and they found newspapers had functions to communic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municate upper and lower. They also realized that newspapers can represent public opinion and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parliamentary system, so newspaper was considered to be an essential of state prosperity. The intellectuals in treatyport cities took newspaper as plebeian's principled criticism, which could help them to participate politics again, so newspaper was considered to be a skill of erudite and informed, and a way to rule a country. Although the conflict and strain emerged when integrating western new knowledge and ideas of modern newspaper into Chinese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ideas, Chinese intellectuals remoulded the new knowledge and ideas of newspaper and formed their ideas of journalism under the frame of "Chinese learning fo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 Keywords

Early envoys of the Qing Dynasty, Modern newspaper, Ideas of journalism, Sociology of knowledge, "Chinese learning fo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 Author

Tu Lingbo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Television School, Facult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tulingbo@126.com.

## 一、新闻观念与被遮蔽的历史叙事

19世纪以降,现代报纸在中国的兴起通常被表述为这一历史叙事:即中国近代报刊是沿着从中国域外到中国域内、从英文报纸到中文报纸、从外国人办报到国人办报的演变轨迹。这种经典的新闻史叙事在呈现历史面目的同时,暗含了如下预设,即现代报纸同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文明、现代性一样,是西方冲击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我们看到的只有“世界走向中国”而没有了“中国走向世界”,这无疑遮蔽了后者的历史叙事。“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缺陷,主要在于“受渊源于西方的关于历史应如何发展之假设的制约,以及同样渊源于西方的历史为何按此发展或不按此发展的一些固有问题的制约”。(柯文,2002)另外两个困惑亦随之产生:其一,既然古代报纸最早源于中国并一直延续了下来,那么中国的现代报纸为何不是

“内生”而是“外生”的结果？其二，就中国人认识报纸的水平和程度而言，为何对传统报纸与现代报纸有着如此大的差异？

后一个问题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即讨论19世纪中国人的新闻观念出现的一种变化。“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细一点讲，观念可以用关键词或含关键词的句子来表达。人们通过它们来表达某种意义，进行思考、会话和写作文本，并与他人沟通，使其社会化，形成公认的普遍意义，并建立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金观涛，刘青峰，2010）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自觉的新闻活动（广义或狭义）的背后都有某种观念作为支撑，它是以新闻、报道、报纸、媒介、传播等关键词来表述的话语体系，是对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的认识和理解。如果从广义上来界定“新闻观念”，那么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新闻、新闻传播、新闻媒介、新闻业、新闻活动等是什么的观念，这是一种事实观念、科学观念；二是新闻、新闻传播、新闻媒介、新闻业、新闻活动等应该是什么的观念，这是一种应然观念、价值观念；统一的新闻观念，是事实观念与价值观念的融合统一。（杨保军，2014）

在一般意义上、广义上使用新闻观念的概念，有助于我们透过历史文本，去审视其中的只言片语或长篇大论，从而勾勒人们对于新闻的认识和理解，即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新闻观念。本文所研究的新闻观念，是一个超越报刊等具体媒体的整体概念，是事实观念与价值观念的结合，因而不用通常所用的“报刊观念”，也不仅局限于考察人们对于“报刊”的认识，也关注其与其他观念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当然，对于19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接触、认识和理解的主要对象，还只是早期形态的现代报纸，这一媒介既不同于成型的现代报纸，也大大不同于邸报、京报等传统报纸，因此，19世纪中国人的新闻观念，主要是一种报刊观念。

此外，不同于新闻思想或新闻传播思想，新闻观念的考察对象不局限于某一类人（比如梁启超、徐宝璜、邵飘萍等）和某些经典的文本，而是将范围扩大到那些对新闻现象、新闻活动有过观察和思考的人物与文本。进一步讲，新闻观念史不同于新闻思想史。当然，考察范围的扩大并非漫无边际，主要基于两点：其一，考察那些敏锐地对新事物作出过叙述的人物及文本，即处于新、旧之间交叉地带的历史类型；其二，通过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考察新闻观念背后的知识、权力及社会关系，将现代报纸在中国的兴起当作一种新知识的生产过程。对于后者，黄旦认为，19世纪的现代报刊不仅是作为传播新知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种“西学”；传教士引入的报刊，在国人和外国人办报的建构下，为中国人打开了认识现代报纸

的窗户，共同酿成了晚清中国人理解报刊的基本水准和接受报刊的知识氛围。(黄旦,2011)

如是，我们还需追问，除了自西向东的知识输入和观念影响外，中国人如何自东向西地“走向世界”，主动地观察、了解和认识现代报纸？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怎样获取关于新闻的知识、形成了怎样的新闻观念？事实上，有这么一类人，他们主要是在中国域外接触现代报纸，并产生了一定的新闻观念。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 in treatyport cities*）<sup>1</sup>，清廷派往西方国家的使臣及其叙述也应该被详细考察。1840年代到1860年代，几本重要的著作相继问世：包括林则徐主持翻译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合省国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这些著作初略地介绍了“新闻纸”、“新闻”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都是二手的、模糊的。直到1860年代后，清廷派遣的出使大臣有机会直接接触和观察西方的报纸，他们对此有所认识和记述。这些记述，既是西方传教士传入的西学知识的极为重要的补充，又是中国知识分子关于西方世界的话语陈述，表现了他们观念的碰撞、视角的转换。作为19世纪新闻知识引入中国的纽带，他们的新闻观念不应该被忽略。这正是上文所述的、需要被重新发掘的历史叙事。

在这些早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身上，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与世界等二元关系的交织和冲突，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在亲身体验中既接触中国的传统报纸又与西方的现代报纸发生关系。如果说现代报纸不仅是一个信息传播工具，而且是一种“西学”和“新知”的话，那么，它同样是中国人产生现代性体验、现代性思考和现代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邸报、京报等传统的媒介并未带给中国人脱离于传统社会结构的体验和思考。一切都与过去有所不同了，“走向世界”的那部分中国人，无疑深有体会。

从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来看，“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至少发生了两点变化：其一，西方世界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察现代报纸的“视角”。卡尔·曼海姆指出，“视角”表示一个人观察事物的方式，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以及他怎样在思想中构建这种东西，社会进程对“视角”既有着本质的渗透，且独立的“视角”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获得。(卡尔·曼海姆,2007)其二，他们在有别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语境下获取了关于新闻的知识，并将之建构为一种“社会现实”，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观念，并成为了19世纪中国新闻观念的一部分。恰如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所言，“知识社会学”处理的正是人类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经验“知识”被社会地构建为一种“现实”的各种过程，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会从各种途径参与到社会中的

“知识”工作中去。(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2009)正是这些“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将一种新的关于报刊的知识与观念,通过各种途径(著述、上书、办报、通信、对话等)输入到中国社会的肌理中,并“构建”了一种关于报纸的新叙述,成为了中国现代性历程中早期的新闻观念的重要一部分。

## 二、出使大臣的新闻观念

19世纪中叶,已有几个中国人到达过欧美。林鍼于1847年旅美,1849年归国后作《西海纪游草》一书;1847年,容闳旅美读书,在耶鲁大学取得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美国留学生。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到西方国家并且作出了自己的记述,大体上要等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最早作出记述的知识分子则主要是清廷派往欧美的使臣。(钟叔河,2010)

### (一) 知洋务——内外通情的工具

1866年,总理衙门派遣斌椿率同文馆三名学生前往欧洲,这是官方遣往西方的第一批代表。与斌椿同行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在日记《航海述奇》中记载了“新闻”和“新闻纸”,(马西尼,1997)他提到了法国火车“第三车沿途刊印新闻纸,携带信文”,“印造新闻纸处每日出六万七千张,日有二百餘人在城市寻访事故”。(钟叔河,2010)然而,老迈的斌椿和年幼的张德彝并未过多关注新闻纸。

1876年,清廷第一位使臣郭嵩焘出使欧洲,开始详细考察西方世界。郭嵩焘是较早接触“洋务”的清朝官员,他认为办洋务首先得了解“洋情”。咸丰9年(1859年),他就指出“通市二百餘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咸丰11年(1861年),他又写道“国家无人久矣!国体、事要、商情、地势四者无一能知,外人亦遂加之愚弄”。(钟叔河,2010)

郭嵩焘在英国和法国担任使臣期间,经常阅读英法两国的报纸以获取新闻,了解西方国家关于中国事务的态度,以便处理中西之间的外交事务。<sup>2</sup>与同时代的清朝官员相比,郭嵩焘格外重视新闻报道,这与他试图尽可能多地了解“洋情”是分不开的。比如,他在日记中清楚地写道:

新嘉坡得《代模斯》日报二纸,锡兰得日报一纸,中论滇案事宜各数则。洋情、国势、事理三者,均有关系……谓即此可以推知洋务情形,而求得其办理之法。环顾京师,知者掩饰,不知者狂迷,竟无可告语者。中国无人久矣!此可谓太息流涕者也。(郭嵩焘,2012)

从林则徐探查“夷情”,到郭嵩焘的“知洋务”,清朝官僚似乎只看重报纸的

工具属性,然而,郭嵩焘并没有止步于此。他于光绪三年(1877年)正月二十三日参观了泰晤士报报馆,这一经历令他大为震动。在“馆主”马克敦罗的陪同下,他仔细考察了这家英国报业的巨头,并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报纸的印刷流程、价格、版面、用工、电报传送等情况,此处仅摘录一段如下:

初用机器制出铅字廿六字母,送校对处校之……合四铅板成新闻报一张,置印文机器中。卷纸逾数百丈,若洋布然。印车动,随转随印,至前截断其纸,而用扇板前后扇之……印刷新闻报七万纸,不过一点钟可以竣事。(郭嵩焘,2012)

## (二) 公论——民意的代表

除了惊叹于泰晤士报的高超技艺外,郭嵩焘还注意到报纸与西方政治的关系。郭嵩焘认为,新闻纸有两大功能:其一,传布政事、登载民意;其二,为“公论”之场所。

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辩驳,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所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属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也。所行或事有违忤,议院群起而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恣意妄为者。当事任其成败,而议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周礼》之讯群臣、讯万民,亦此意也。(郭嵩焘,2012)

郭嵩焘注意到,新闻纸是民意的代表,是登载公论的地方,新闻纸与政治是相互分离但彼此影响之关系。执政“稍据其所言”,但“不以民意进退”,换言之,新闻纸是新闻纸,政治是政治。于是,新闻纸并不可以恣意妄为,因为议院有可能会“群起而攻之”,如此,新闻纸“则无以自立”。郭嵩焘对新闻纸与议会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印象深刻。他在得知德国首相俾斯麦要控制议会和报纸时,写道“德人大哗,谓如此不如竟废议绅……(西洋议院)其间有利有病,民气过昌则主权日替。德国谋收主权……操之过急,则将溃而四决以成乱乎;操之缓,则终无济也。”(郭嵩焘,2012)

郭嵩焘用“新报”来称呼西方报纸。据研究,“大约自19世纪五十年代中叶起,人们开始用‘新报’来称呼近代报纸了,其用意是在说明这种报纸与旧式的‘邸报’有别,以‘新报’作为报纸的名称,一时成为风尚。”(方汉奇,1992)“新报”这一词汇正好表现出洋务运动的新观念,即向西方学习“西学”、“新学”。

“新学”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求知动向,是当时知识分子以传统学识为基础,吸收



西方新知,融会贯通而创造的新观念,像“洋务”、“格致”、“治器之道”、“商战”等新词汇也就在此新观念的时代背景下相继出现了。(王尔敏,2005)新报之“新”正好与这一时期的新观念相吻合,成为知识分子视野中的新事物,于是,新报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公论也被置放于新学的框架下。

### (三)富强之本原——教育和文化功能

随着清廷向西方派驻使臣的增多,知识分子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也变得频繁起来。19世纪九十年代后,知识分子获得了更多关于新闻与西方政治的知识,其中,薛福成和宋育仁的论述值得一探。

相比郭嵩焘,薛福成对西方政治的观察更为立体和深入。他比较详细地考察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和科学技术,探究西方国家富强之本原,探讨“君民共主”政治体制和“民主”体制的优劣等问题。根据他的考察,西方国家“谋国之要有三:曰安民,曰养民,曰教民”,其中养民最重要之新法共二十一条,包括造机器、筑铁路、立合约通商、增领事衙门、通各国电线、立商务局等等,其中第三条即为“设邮政局、日报馆,以通消息”。(薛福成,2012a)

后来,薛福成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西方国家富强的本原,主要有五方面:“一曰通民气,用乡举里选,以设上下议院,遇事昌言无忌……则上下之情通矣。二曰保民生,凡人身家田产器用财贿,绝无意外之虞……三曰牖民衷……终身无一废学者,何也?有新报之流传,社会之宣讲也。四曰养民耻……五曰阜民财……”(薛福成,2012a)

可见,除了通消息的作用外,薛福成还注意到了报纸的教育和文化功能。在他看来,新报馆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本原之一,“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矣”。(薛福成,2012a)1890年代,在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20多年后,薛福成以对西方世界的亲身观察,反思了洋务运动的局限——重器艺之“术”而轻政治之“本”。这其实也是对冯桂芬思想的继承和回应——“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葛兆光就把19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主要是出使大臣和士人)看作历史观念、文明观念的一个根本变化,“对于外部世界的历史知识就越来越多,也渐渐接受了世界上有与中国同样古老和灿烂文明的历史观念”。(葛兆光,2009)

### (四)上下通情——从议会制度到清议

随后前往欧洲的宋育仁,继承并扩展了郭嵩焘、薛福成的新闻观念。1894年,宋育仁出使欧洲,担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之后他撰写了《采风录》四卷,介

绍西方的政教风俗。

宋育仁详细地考察了英国的议会制度。他在记述上下议院的运作时，特别指出议院中“南楹为报馆听议处，设案置笔扎”，继而“朝闻议，则夕登报；夕闻议，则朝登报”；他注意到，议院制度为西方政治的核心，“议院为其国政之所在，即其国国本之所在，实其国人才之所在。顾人才聚于议院，而其源出于学校……西治之最可称者，惟议院、学校二者相经纬”；他对比了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后，非常自信地谈到“中国如设议院，进士流而相与议政，先有礼仪为持议之本，遇事奉经制为法守，有疑引圣言为折衷，较外国事易而功倍”。(宋育仁,2012)显然，宋育仁不仅极其欣赏议院制度，还对其抱有信心。宋在介绍外国的税制时，指出“议于议院，揭于报馆，上无所专蔽，下无所蒙遁”，相比中国税制之弊，“君无所私，官无所蠹”，实在是天壤之别。(宋育仁,2012)

据宋育仁的观察，西方议会制度里报纸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此外，他对报纸本身的观察，则详细记载于《报馆学会即清议所在》一文中，该文的主要观点包括：一、报纸为国之清议所在，“主笔者皆必有品望、学望，由学会所推”；二、报纸必须真实公平，“报无不实，论必持平”，且“报馆自重声望，不妄发言”；三、报馆独立运作，申办与批准一般不受束缚，“凡立报馆，必请于国家，国必允行”，但需“由官考察章程，禁其诈索人财”；四、因为议院的运作由报馆“记闻传播”，所以“政虽不以此决从违，民得因此知国事”。宋育仁指出，报馆对国内外政事都有记闻，故欧人“不似中国士民茫然隔膜”，当然，民意也能够影响议院的决策，“一时遍国中百姓或即联名献议，两院议允，即得施行”。(宋育仁,2012)

在另一篇文章《西国上下通情得力于协会》中，宋育仁则介绍了西方的社团（宋称之为协会、社会）、报馆与政治的关系。宋认为，“西国之上下通情，得力于协会（亦称社会），而辅之以报馆”，“协会者，国中同等及同业之人，相约联为一会”，“如中国会馆”。宋把西方的协会分为两类：一为上等协会，“皆世爵之家，与律师、博士以学名家者”；二为次等协会，即“富商大贾”。上等协会多在上议院，而次等协会多在下议院。报馆则没有明确的划分，但“其大报馆类有博士主之”；上等协会和次等协会，“辅以新闻报，则四通八达如在一堂”。(宋育仁,2012)

宋育仁关注的焦点，已是西方政治制度中议会的具体运作方式了。议会在向社会传达政事、收集民意的过程中，报馆是必不可少的机制。然而，19世纪后半叶，



中国人对西方政治的相关术语还非常陌生,也很难真正理解其运作之机制。因此,我们看到,在出使大臣们的叙述中,不仅经常变换“新闻”、“新闻纸”、“新报”等称呼,而且其他重要的政治词汇,比如协会、议院等,都要借助中国本土的词汇和概念来诠释,从而证明它的正当性(legitimacy)。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话语的修辞方式,以此来更稳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显得与传统格格不入,成为一个纯粹的异类和他者。另一方面,从传播效果的角度考虑,这种方式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他的观点,而不至于误解和曲解。因此,这就能解释为何宋育仁要将报纸当作“清议之所在”。当然,将报纸当作“清议”不只是一种修辞方式,它也是新闻观念在1870到1890年间的一种重要表现。

### 三、口岸知识分子的新闻观念

王韬、郑观应、洪仁玕与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新闻观念,常常被放在一起讨论。(方汉奇,1992;胡太春,1987)这种分类法符合“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史学范式,但却忽略了他们之间的显著差异。与出使大臣们相似,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口岸知识分子亦是“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他们的新闻观念一方面与他们身份地位、社会交往和所处的口岸环境相关,一方面又与获得的关于报纸、新闻的知识有关。

#### (一) 参与政治——庶人之清议

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宦途,几乎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惟一道路。重要的是,科举本身已经成为了传统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价值认同的唯一标准,是“修齐治平”的现实化身。明清两代,由于人口的增长,应试者增多,加之科场規制极严,科举入仕相当不易。(何炳棣,2000;王德昭,1984)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逐渐繁荣起来的口岸城市为缓解人口压力正好提供了新的机会。新的社会力量在城市社会中开始出现,主要包括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陈旭麓,2012)王韬这类无法进入科举仕途的知识分子,便在这种历史社会的环境中,从乡土社会中脱离出来,成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熟悉西方文化的口岸知识分子。很难用现在的经济社会指标来划分口岸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至少在文化价值层面他们仍然保持着传统士人的精神。

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一文中对“泰西日报”推崇备至,他谈到,“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

也。”(王韬,2002)王韬的论证思路,是先谈泰西日报兴盛,缘于其为庶人之清议,之所以能为庶人之清议,又因其日报主笔“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然后他再简要回溯了中国日报的历史,指出“日报之渐行于中土,岂不以此可见哉”,但是当今日报的通病是采访失实、纪载多夸,言下之意是无法做到庶人之清议;于是乎,主笔之人尤为关键,“顾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王韬,2002)

可见,与持有改良主义立场的使臣一样,王韬的新闻观念核心仍然是“清议”。只不过,他不是仕途官僚中的成员,也算不上传统的乡绅文人。经过“上书太平军事件”后,他以流亡者的身份到达香港,从此丧失了进入仕途的一切可能。因此,王韬把自己放在了“庶人”的位置上,这从他自号“天南遁叟”、“淞北逸民”可以看出。不过,即使是一介平民,也可以评议时政,表达变法的思想,通过日报成为“庶人之清议”,从而间接影响朝政。当然,前提是主笔者必须“绝伦超群”、“慎加遴选”,才能够有资格代表、反映“庶人之清议”。

显然,王韬把自己当作了精英式的主笔者,因此是有资格代表庶人阐发“清议”的。这也是为何他要重点强调主笔的品质的原因,那就是将自己与那些“挟私讦人,自快其忿,品斯下矣”而为“士君子摈之不齿”之人划分出界限。于是乎,王韬就以另外一种方式参与到了政治当中,延续了他的仕途梦想。正如柯文所指出,“对于像王韬这种未能以传统方式追求权力和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报纸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新途径。”(柯文,2006)

当然,王韬把报纸当作“庶人之清议”,有一定的时代背景。19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清流派在清朝最为得势的时期,当时有所谓“翰林四谏”、“四谏”、“十朋”等名目。既然清议具有相当强的力量,那么在朝在野的知识分子也就无不对之侧目了。不过,如果说王韬仅仅把报纸当作清议的工具,却有失偏颇。一方面,从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的运作来看,主要依赖于其刊载的商业新闻所取得的经济效益,这份报纸对新闻信息亦相当的重视。(戈公振,2011)另一方面,王韬还表达了报刊能够“广见闻、通上下”的观点。在《循环日报》上刊登的《倡设日报小引》一文中,他谈到报纸“广见闻、通上下、俾利弊、灼然无或雍蔽贯,有裨于国计民生者也”;此后,《循环日报》又谈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重要性,“且夫国之大患,莫若民情壅于上闻。民情不通,即虽有水旱盗贼皆蔽于有司,莫得而知矣。”(卓南生,2002)

## (二)“通今”与治国之道

王韬的思想观念中,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在当时来说都颇为前沿,与传统的观念有着极大的差异,可以算作现代性的思想。(柯文,2006)但就其新闻观念来说,却并非那么现代。我们可以看到,总的来说王韬的新闻观念停留在“庶人之清议”的框架下,他并没有对报刊与西方政治(特别是议会制度)的关系有过深入地考察,也未将报刊的知识放在他变法自强思想的关键位置。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不能对王韬要求更多。在一定意义上,王韬和容闳、何启、唐廷枢、伍廷芳、郑观应、马建忠、马良等人一样,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者,而这些所有的沿海改革者都具有现代精神,并且几乎所有的沿海改革者都参与了创办中国近代报刊。(柯文,2006)

王韬多次通过议论、上书,表达了日报可以通中外之消息的观念,即“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甚至还可以通过西方的日报进行“对外宣传”<sup>3</sup>。这与出使大臣们的新闻观念极为相似。从早期林则徐、魏源通过新闻纸收集“夷情”,到张之洞总结的“知外患而豫防也”,在中西之间的外交关系、政治关系中来界定、描述报纸和新闻,是19世纪下半叶最为明显的新闻观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王韬的新闻观念中,还表现出一种“通今”的观念。

王韬认为,洋务的关键在于“通今”,西方国家的“通今”之术值得学习(王韬,2002):

故吾尝谓,中国之士博古而不知今,西国之士通今而不知古。然士之欲用于世者,要以通今为先。……泰西各国制造电线,由其国都以达中土,邮筒传递,顷刻可通,而中国独无之,未免相形见绌。(《洋务在用其所长》)

且铁路之所至,亦即电线之所通,其消息之流传,顷刻可知。(《建铁路》)

至于中外新闻其有足以资国计、便民生、助谈噱者,亦必原原本本务纪其详,勿使稍有所遗漏。(《本局告白》,载《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

因此,如果从王韬的“通今”观念出发,以下问题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解答:为何《循环日报》既注重商业性新闻和一般性新闻的报道,同时又深深地烙下了王韬的政论色彩,而不只是普通的商业报纸?因为,除了刊载商业性信息满足读者需要,获取报纸的运作经费外,“中外新闻”的流传,是满足士人“通今”的需要,而“通今”则是变法自强、兴办洋务之法。硬币的另一面,王韬的政论也是变法自强的途径,通过“庶人之清议”,从而使“民情得以上达”。因此,王韬的新闻观念最终指向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治国之道,按照王韬的说法,即达到三代以上的治世:

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察其痾痒而煦其疾痛，民之与官有如子弟之于父兄，则境无不治矣。(王韬,2002)

#### 四、“走向世界”的紧张：观念冲突与“新闻”知识的改造

19世纪下半叶，“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是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主体之一，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投身于洋务运动，而且通过思想和著述影响了清廷中的其他改良主义者。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新闻观念中各种要素之间的冲突与紧张不可避免，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知识分子心中理想的或想象的新闻观念。

##### (一) 观念冲突与“西学中源”说

1890年代前，西学的输入相当缓慢，除了少部分办理洋务的官员外，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生活在他们自己传统的精神世界里。相比于西学在日本受到的极大的欢迎，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冷淡态度，在西学译书的销售数、现代学堂的招生数、书院课堂中西学的禁止等方面展露无遗。(费正清,1985)士大夫们对儒家文明的认同和自信，一方面来源于经典的儒家教义，这些教义早已成为了政治哲学的教条；一方面则来源于中国历史的经验，即历史上王朝的治乱盛衰，都可以通过儒家制度来进行调节，事实也的确如此，士大夫心中的十八世纪“盛世”情结还很浓厚。

因此，不管是出使大臣还是口岸知识分子，当他们试图将现代报纸的知识和新闻观念推行于中国时，遭遇保守官僚的反对，并不令人惊讶。比如，安徽巡抚王笃棠在奏请设立译报馆的奏折中就谈到，“或云洋报坏人心术，惑人耳目，此误国之言，欲以塞我皇太后皇上之聪明，不复求所以御侮之策也。”(戈公振,2011)可见，当时保守的官僚不仅很少接触、阅读报纸（当然，并不包括邸报、京报）<sup>4</sup>，而且对现代报纸所知甚少，他们大多将新闻纸、新报归于小报的范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保守的反对者中也有“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刘锡鸿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刘锡鸿是与郭嵩焘一起出使英国的副使，两人之争也是晚晴外交史上的著名事件。有研究者认为，刘不但思想较为保守，他全力捍卫“圣人之道”，希望能够“用夏变夷”，而且是清廷安排在郭嵩焘身边的“监督”，使他们互相钳制、彼此掣肘。(王立诚,2012；钟叔河,2010)刘锡鸿的日记中有两篇文章与报纸直接相关，即《伦敦新闻纸无异中国之宫门抄》和《印报何为必用机器》。不用说，单就文章的题目，我们就能看出他的保守立场。与郭嵩焘的记载相比，刘锡鸿

对西方新闻纸的记载无疑也相当详细，特别是关于参观泰晤士报馆的记载<sup>5</sup>，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鲜明的观点：

伦敦新闻纸，乃清议所系，国主每视其臧否，为事之举废、张弛……无异中国之宫门抄、辕门报者也。(刘锡鸿,2012)

电弛风掣，为时仅及瞬息，新闻纸质堆案者，已累累然……以余迟钝之见筹之，若专用人力，当令每人自备活字板一份……是二万数千人生命，托于此矣。何为必用机器，以夺此数万人之口食哉？(刘锡鸿,2012)

刘锡鸿的保守立场，在当时并不足为奇，倒是郭嵩焘、冯桂芬们显得另类，常常被当时的主流观念斥为“荒谬”。可以说，这正是1860到1890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心态，即对西方“奇技淫巧”的怀疑，认为中学为西学之源，中国文明优于西方文明，而治国之根本还在于得人心。刘的日记中大多就是这样的文章，诸如《中国历法可为万世法》、《火车不能行于中国》、《英国不知节用为治国之要》、《英以民制民之制与汉明略同》、《以机器代人工使人易为恶》、《中国以不贪得为富以不好胜为强》等。

除了刘锡鸿这样的保守官僚，那些比较开明的使臣也不得不面对和处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的矛盾。道光朝后，流行的“西学中源”说就影响了早期改良主义者，他们将仿效西方富强之术称为“礼失而求诸野”，借此证明学习西方、效法西方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谢放,虞和平,2009)薛福成在考察西方时认为，“所谓西学者，无非中国数千年来所创，彼袭而精究之，分门别类，愈推愈广，所以蒸蒸日上，青出于蓝也”，(薛福成,2012a)因而也就难免穿凿附会地写道，“西国博雅之士，论及创制，每推中国。如新报之仿邸抄，化学之本炼丹……”。(薛福成,2012b)此外，即使如刘锡鸿这样持保守立场的官僚，也惊叹于英国机器的精巧、伦敦的整洁、议会的美好、监狱的完善等现代社会风貌。他甚至还感叹道“惜翻译人少，未由遍读新闻纸……向谓洋语洋文不必广募人学习者，误耳！”。(刘锡鸿,2012)正如余英时先生指出，道光以后，内忧外患导致深刻的危机感，使许多读书人不复能从容治学，走经典考证的老路了，这时的知识界可以说是普遍地要求改变现状。(余英时,2013)

但是，尽管时代变化了、时势变化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来源还是以儒学为主，思想世界和信仰世界并未真正的解体。西方的新知识、新观念，与传统知识、传统观念的激烈碰撞，造就了各个层面的矛盾和对立。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善于在观念的冲突中寻找协调一致的方法，即将关于报

纸、新闻的新知识与传统知识进行对接。

## （二）“新闻”知识的来源与改造

19世纪下半叶，清廷派遣的出使大臣逐渐增多，但仍然屈指可数；口岸知识分子的人群在逐渐扩大，但相对于庞大的中华帝国而言，他们仍然是形单影只的“一小撮”。口岸知识分子长期浸淫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即身处一种独特的通商口岸文化之中。格里德尔指出，“通商口岸文化，大致由商人和传教士构成的社团所创造，是商人的自私自利和福音派教会热情的联合体。”（格里德尔,2010）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就是这种社团的典型代表之一。墨海书馆出版了中文读物共210种，除了宗教宣传品占绝大多数外，还涉及天文、地理、植物学、数学、物理、医学等方面。（熊月之,2011）这些出版物是西方知识进入中国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系统化地引入西方知识的开端。

从口岸知识分子获得“新闻”知识的角度，其来源主要为四方面：其一，由墨海书馆等传教士社团出版的西学书籍，其中裹挟着关于西方“新闻”、“新闻纸”的介绍，比如传教士裨治文（E.C Bridgman）编撰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不过，这些书籍刊载的知识很少。其二，传教士所办报刊中的“新闻”知识，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载《新闻纸略论》开始，有关报纸、新闻的知识就越来越多，比如《教会新报》中的“各国新报馆数”等。（黄旦,2011）其三，通过对西方国家的考察，亲眼观察、收集的“新闻”知识。其四，通过办报活动，从实践中获取的“新闻”知识。

实际上，很难判断哪一种“新闻”知识来源对他们新闻观念的形成最为关键。如果以王韬为例，我们发现，后两种知识来源的影响较大。1867年，王韬游历法国和英国，并主要在苏格兰中部克拉克曼郡的一座小镇上生活了两年，协助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中国经典，直到1870年返回香港。柯文指出，在欧洲的生活和旅游并未使王韬对西方的看法发生激烈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在他离港之前便已发生，不过这段经历却对他新的职业准备起了重要的作用，欧洲现代化的造纸厂、印刷厂深深地吸引了王韬。（柯文,2006）在欧洲王韬频繁地接触现代报纸，并利用报纸上的知识来进行写作。王韬所作的著名的《法国志略》即是这样完成，“此外就见闻所及，或采自他书，或录诸邮报，益以广述八卷”。（王韬,2002）于是，王韬回到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便特意说明该报“广为翻译，备加汇罗，俾足以佐中外、稔外情、详风俗、师技艺。其良法美意足以供我揣摩，地理民风，足以资我闻见，则尤今日所急宜讲求者也”。（循环日报，1874）



19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中英文商业报纸逐渐兴起。自1840至1860年,全国先后所出英文报刊约24种,香港约占17种,《中国之友》、《香港记录报》、《德臣报》、《孖刺报》等相继创办。这一时期中文商业报纸的兴起引人注目,口岸知识分子的参与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比如黄胜、伍廷芳参与编辑《香港船头货价纸》(后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陈言(陈蔼廷)参与编辑《中外新闻七日报》,王韬参与编辑《近事编录》等。(方汉奇,1992)没有口岸知识分子进行语言和文化的译介,很难想象西方人创办的中文报纸会获得成功。同样,这些口岸知识分子也在办报过程中,获得了新闻的实践知识。正如前面指出,口岸知识分子的圈子很小,他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很大,他们的办报活动往往相互联系。‘通过实践获得的“新闻”知识,是很容易相互影响和传递的。

事实上,在王韬的新闻观念中,可以发现“新闻”知识改造的痕迹。王韬特别强调主笔者的资格和能力,这是他心目中报刊作为“庶人之清议”的关键一环。不难发现,王韬对西方的“新闻”知识抱有一定的想象,他不仅夸大了报刊在社会中的作用,而且将主笔者的水平提高到“绝伦超群”的程度。这与19世纪欧美新闻业的现实是有所出入的。据考证,王韬的外语水平相当一般,可能会一点英语,但没有材料证明他能熟练地阅读英文,他的主要翻译工作,是将传教士译本润色美化。(陈恒,方银儿,1998)这说明王韬不太可能直接读懂英文报纸,当然对英文报纸主笔及其文章的水平,就不可能有深入地判断。

那么,王韬对报纸主笔者的认识,或许就是对他自己身份的投射和想象。口岸知识分子直接接触西方知识和文化,更倾向于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知识更新,一般被称为变法、改良,或者变革。在他们的新闻观念中,人的主体性得以被强调,以此来说明自身和报刊的正当性。此外,口岸知识分子虽然是边缘化的、体制外的身份,但他们并未放弃通过另一种方式回归帝国的主流话语的努力,他们尽可能地将西方知识与传统知识相联系,试图在“清议”、“通今”、“治国”等话语中找到坐标。总的来说,这与他们独特的身份和所处的地理、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

## 五、结语:“中体西用”框架下的新闻观念

对于早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如何认识、理解西方的现代报纸,如何解释其与传统邸报、京报之间的差别,进而又如何看待现代报纸在政治系统、文化环境及社会体系中的功能,这些观念既受到西方“新闻”知识的深刻影响,又被中国传统知识资源和思想根源所塑造。这一思想根源就是官僚士大夫对由儒家学说构造的

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学的坚信不疑,19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相信“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在面对东西碰撞时大多笃信“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正如汪晖指出,“作为一个道德/政治共同体的普遍价值观,天理构成了‘前西方’时代中国的道德实践、文化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概念。”(汪晖,2004)

因而,在19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即使是西方先进的器物典章(尽管在洋务运动早期只接受器艺技术层面,而非制度文化层面),也可以纳入到儒学本源中得以解释,从而成为中国富强之“术”和“用”,以再造中国政治、文化之“本”和“体”。哪怕对于思想超前的冯桂芬、郭嵩焘等人来说,也无法接受中国制度之本不如西方的观念。佐藤慎一也指出,与日本近代化改革不同的是,主导中国近代化改革的学者一官僚型士大夫缺乏近代官僚制中所必备的专门知识,而是具有中国士大夫精神构造的浓厚印迹;因而善于用“附会”的逻辑,将外来的事物与中国固有的事物联结起来,以此输入外来事物正当化的逻辑,而非像日本那样,具备明确的“文明开化”的口号。(佐藤慎一,2006)因此,19世纪的改良主义者们自然地运用理与物的关系来对西方知识进行分类和阐释。理与物的关系是儒学本体论范畴内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以不同的方式得以表达,其中通行的一对概念范畴是“道”与“器”,或是“体”与“用”。(费正清,1985)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体”与“用”二元论关系最具代表性的观念,也被认为是洋务派核心思想的总结。张之洞指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张之洞,1898)李泽厚这样评价张之洞的思想,其一,“器”已不仅指工艺器械,也包括某些政经体制,“器”可改,但“道”却绝不可变,“道”指的是伦常纲纪,即封建专制为特征的政治制度和家庭为本位基础的社会秩序;其二,“道”、“本”是与“孝弟忠信”的个体的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治身心”的“内学”,不同于应付世俗外事的西学。(李泽厚,2008)因此,张之洞关于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讨论,可以当作19世纪下半叶清朝官僚中改良主义思想的根本原则。他在《劝学篇》中对报纸的整体阐述,也可以看作反映了“走向世界”的中国人的核心新闻观念或理想的新闻观念。

张之洞关于报纸的整体阐述见《外篇·阅报第六》。单独用一篇来专门论述报

纸,在清末官僚的思想论著中是罕见的,即使在王韬的著述中,我们也难以发现他把报纸放在如此显著的层级上。若是考虑到张之洞在清末政治中的权力和影响力,这一点是不应当被忽略的。

《阅报》是《外篇》中的第六篇,按照张之洞的解释,“《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张之洞,1898)在张之洞的政治设想中,报纸是“务通”、“应世事”之术,其关于报纸的主要观念如下:

一、报纸能够通天下之事,知世事之变,达民情,得思想之切磋。因为“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内政、外事、学术无不登载,所以“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

二、中国报馆从无到有,已有一定规模,“虽论说纯驳不一,要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酖毒,破扞谗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篚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

三、各国洋报广宣各国政事,“俾我得以监听而豫防之,此亦天下之至便也。”同时,洋报“诋訾中国不留余地”,但这不足动怒,因为“古云士有诤友,今虽云国有诤邻,不亦可乎!”

四、报纸对中国人最大的好处是能使其知晓国政时局之弊病。“吾谓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

张之洞新闻观念的核心,是新闻与政治的关系:一是可知内政的弊病,下宣国事,上达民情,唤起国人的志气;二是可知外政而防范。可见,与出使大臣、口岸知识分子的新闻观念相比,张之洞更多地将报纸的功能定位于“上下通情”和“内外通情”,报纸是一种“通今”之术,也是“文以载道”传统的体现。

于是,在张之洞的论述中,报纸、新闻就由西学、新学——一种新知识转换成了为中学服务的技术。准确地讲,成为了一种官僚技术,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阻止清王朝的衰退。张之洞在《阅报》的前一篇《广译第五》中说得很清楚,“今日急欲开发新知者,首在居官任事之人,大率皆在中年以上,且事烦暇少,岂能挑灯细读?”(张之洞,1898)显然,他所谓的阅报的对象,也正是这些“居官任事”之清朝的官僚,报纸的功能就是“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令人遗憾的是,不管是出使大臣还是口岸知识分子,他们新闻观念中的“现代”色彩——作为民意代表的“公论”,作为国家富强之本原,作为议会制度的重要环节,作为政治参与的渠道——已经逐渐褪去,在与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对接中,

报纸被主要当作一种为统治服务的工具,新闻观念也被调和为一种“中体西用”框架下的实用观念。

(责任编辑:朱立芳)

### 注释 [Notes]

1.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或者口岸知识分子)概念来源于柯文。他认为,王韬这类人代表了中国大地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他们深受儒学经典训练,但却因各种原因没有进入官僚仕途,在中华世界的边缘活动。柯文将这类人称作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柯文,2006)
2. 需要说明,郭嵩焘不会英语,他的翻译团队中就有1866年出游欧洲的张德彝。郭嵩焘的日记中至少有超过十次以上记载他阅读报纸的情况。(郭嵩焘,2012)
3. 参见《弢园文录外编》中的《变法自强上》、《遣使》、《使才》、《设领事》、《洋务在用其所长》等篇目;另参见《弢园文新编》中的《上徐中丞第二书》、《代上丁中丞书》、《上丁中丞书》、《与唐景星司马》等篇。
4. 19世纪的清朝官僚、士大夫,普遍以读洋书、习洋学为耻辱,对模仿西法极其反感。(李剑农,2011)
5. 不过,有研究者发现,刘锡鸿的日记与首席翻译官张德彝的日记颇为雷同,刘可能抄袭了张的日记。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是否真是这样,但不管怎样,他的日记是公开出版的,日记里的记载能够代表他的观点。(王立诚,2012)
6. 伍廷芳、黄胜、陈言、王韬、何启等人关系密切,办报也相互协助。(柯文,2006;张礼恒,2002)

### 引用文献 [Reference]

- 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2009).《现实的社会构建》(汪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67).
- [Berger, P. & Luckmann, T. (2009).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7).]
- 陈恒,方银儿(1998).附录一:王韬研究的几个焦点问题.载王韬(编),《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 [Chen, Heng & Fang, Yiner (1998). Several Central Issues on the Study of Wang Tao, *Second Volume of Wang Tao's Essays*.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陈旭麓(2012).《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Chen, Xulu (2012).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方汉奇(1992).《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Fang, Hanqi (1992).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vol.1)*.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费正清(1985).《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Fairbank, J. K. (198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1800-1911 (Vol. I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戈公振(2011).《中国报学史》.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Ge, Gongzhen (2011). *Journalistic history of China*.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格里德尔(2010).《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81).
- [Grieder, J. B. (2010).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Trans.)*.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1).]
- 葛兆光(2009).《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Ge, Zhaoguang (2009). *History of Chinese Ideologie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郭嵩焘(2012).伦敦与巴黎日记.载王立诚(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上海:中西书局.
- [Guo, Songtao (2012a). London and Paris Diary. In Wang, Licheng, *Six Journals of Kuo-Sung-Tao and Other Ambassadors on the West*.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 何炳棣(2000).《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葛剑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著出版于1959).
- [Ping-Ti, Ho (2000).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Trans.)*.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9).]
- 胡太春(1987).《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Hu, Taichun (1987). *History of Journalism Thoughts in Modern Chinese*. Taiyu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黄旦(2011).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学术月刊》,43(12),139-148.
- [Huang, Dan (2011). The Medium Is Knowledge: The Origin of China's Modern Press Thought. *Academic Monthly*, 43(12), 139-148.]
- 金观涛,刘青峰(2010).《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
- [Jin, Guantao & Liu, Qingfeng (2010).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The Formation of Important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Terms*. Beijing: Law Press.]
- 卡尔·曼海姆(2007).《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原著出版于1931).
- [Mannheim, K. (2007). *Ideology and Utopia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1).]
- 柯文(2002).《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原著出版于1984).
- [Cohen, P. A. (2002).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 Chinese Past (Tra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4).]
- 柯文(2006).《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74).
- [Cohen, P. A. (2006).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 ao and Reform in Late Ch' ing China (Trans.)*.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4).]
- 李剑农(2011).《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 [Li, Jiannong (2011). *The China Political History in the Recent 100 Year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李泽厚(2008).《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Li, Zehou (2008).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刘锡鸿(2012).英轺日记.载王立诚(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上海:中西书局.
- [Liu, Xihong (2012).The British Diary.InWang, Licheng,*Six Journals of Kuo-Sung-T'ao and Other Ambassadors on the West*.Shanghai:Zhongxi Book Company]
- 马西尼(1997).《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Masini, F. (1997).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 宋育仁(2012).泰西各国采风记.载王立诚(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上海:中西书局.
- [Song, Yuren (2012).A Collection of Western Counties.InWang, Licheng,*Six Journals of Kuo-Sung-T'ao and Other Ambassadors on the West*.Shanghai:Zhongxi Book Company]
- 汪晖(2004).《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理与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Wang,Hui (2004).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Vol.1)*.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王德昭(1984).《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 [Wang, Dezhaoh (1984). *Study of the Qi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王尔敏(2005).《晚清政治思想史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Wang, Ermin (2005).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王立诚(编)(2012).《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上海:中西书局.
- [Wang, Licheng (ed.)(2012a). *Six Journals of Kuo-Sung-T'ao and Other Ambassadors on the West*.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 王韬(2002).《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 [Wang, Tao (2002). *Second Volume of Wang Tao' s Essays*.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谢放,虞和平(2009).《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Xie, Fang & Yu, Heping (2009). *Modern Chinese History, Vol3, An Early Attempt to Modernization*.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熊月之(2011).《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Xiong, Yuezhi (2011). *The Eastwar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薛福成(2012a).出使日记续刻.载王立诚(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上海:中西书局.

[Xue, Fucheng (2012a). *The European Diary of Hsieh Fucheng*. In Wang, Licheng, *Six Journals of Kuo-Sung-T'ao and Other Ambassadors on the West*.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薛福成(2012b).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载王立诚(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上海:中西书局.

[Xue, Fucheng (2012b). *The Diary of Four Counties*. In Wang, Licheng, *Six Journals of Kuo-Sung-T'ao and Other Ambassadors on the West*.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倡设日报小引.《循环日报》.

[Hsun Huan Jih Pao (Feb. 12, 1874). *An Introduction to Newspaper*. *Hsun Huan Jih Pao*.]

杨保军(2014).《新闻观念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Yang, Baojun (2014). *Ideas of Journalis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余英时(2013).《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Yu, Ying-shih (2013). *Scholar and Chinese cultur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张礼恒(2002).《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北京:商务印书馆.

[Zhang, Liheng (2002). *From West to East: Wu Ting-fang and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张之洞(1898).《劝学篇》.

[Chang, Chih-Tung (1898). *China's Only Hope*.]

钟叔河(2010).《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第三版)》.北京:中华书局.

[Zhong, Shuhe (2010). *Going to the World: A History of Chinese People's Field Trips to the Western World*.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卓南生(2002).《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uo, Nansheng (2002).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ress (1815-1874)*.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佐藤慎一(2006).《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96).

[Sato, Shinichi (2006). *Modern Intellectuals and Civilization in Modern China (Trans.)*.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6).]